

当代国外福利测算方法研究

——福利与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实证分析

吴姚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就业和经济增长指标来衡量福利水平几乎成为人们共同的标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广泛使用也方便了各国之间以及各自在不同时期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或福利水平的比较。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追求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已成为各国普遍的公共政策目标。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正当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刚刚开始,就已经有许多学者开始质疑这种增长的福利价值。像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帕克德(Packard)的《废物制造者》瑞思曼(Riesman)的《富裕的目的》和米香(Mishan)的《经济增长的成本》等都曾流行一时。随后在60年代又出现了反物质主义论者的“反文化”思潮以及70年代“反增长”的环境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对经济增长的前景产生了悲观主义的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带来的是福利水平的下降,经济效率的提高带来的是人类道德的退化。在60年代中期以前,许多学者开始设计更好的或“替代性”的福利测算方法,这一努力一直持续到现在。

总的看来,新的替代性的福利测算方法基本上遵循了三种模式:扩展帐户模式、社会指标模式和心理模式。

一、扩展帐户模式

很长一段时间,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福利同国民收入等同起来,将人均GDP作为衡量福利水平的一个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但实际上,GDP的目的是对经济行为(而不是对福利水平)的度量,它只是有利于公共政策对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福利的中心问题——减少失业作出适当的反应。将人均GDP作为福利指标的微观基础是不可靠的。在微观层次上测算经济福利的困难相当大:如何将个人或家庭层次的福利水平集合到整个社会的层次,如何将市场价格和商品的数量分解到家庭和个人的消费。实际上,这种理论的前提是把国家同个人混为一体,个人的实际收入就等同于实际的国民收入。而这是相当不现实的,因为国家不是具体的个人,不能以为较高的GDP水平就一定能够提供更多的“福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GDP批评者就不断指出个人的福利体验并没有随GDP增长而改善的这种不对称状况,许多经济学家愈来愈认识到GDP“包含很多对个人幸福没有明显关系的因素,其次是有关福利的关键因素被忽略掉。简言之,GDP是衡量一国经济福利有缺陷的指标”,必须调整GDP内容来得到一个更有意义的福利测算尺度。

与GDP不同的是,大多数“扩展帐户”明确表明是为计算福利而设计的,它们从GDP的内核开始,对消费和资本帐户作

了各种各样的调整。其中,最早最有影响的指标体系之一是诺德豪斯和托宾的“经济福利测算”,一方面,它从总产出中减去了一些“令人遗憾的”价值,如交通往返、警察、卫生设施、道路保养、城市生活的不快之事、防御性支出等,另一方面,在机会成本工资的基础上,它增加了家庭(主妇)劳动的价值和休闲时间的价值。

对这种模式的研究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国都有一些学者从事这种新的帐户的建立和统计工作,如美国的肯德瑞克(Kendrick)、佐洛塔斯(Zolotas)、埃森纳(Eisner)和诺德豪斯(Naudhaus)、英国的贝克曼(Beckeman)、克雷夫(Crafts)以及澳大利亚的斯诺克斯(Snooks)等。在传统的“扩展模式”中,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表明更多的福利来自非市场(而不是市场)行为。扩展帐户的大部分内容就由这些非价格化和非市场化的福利价值构成,虽然它对经济短期变化的敏感度降低了,但它承认了家务劳动的价值,提供了非市场活动的中长期重要趋势,并适应了GDP中较少反映的服务部门崛起的现实(它反映了福利从它过去与物质生产的紧密联系开始转移的长期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扩展模式”的研究在反映日益突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作出了更多的努力。诺德豪斯和托宾在1972年曾经用消费加净投资来计算“可持续的”福利,他们认识到将不可更新资源的耗费纳入其帐户的需要。继他们的研究之后,1981年,佐洛塔斯建立了一个包括不可更新资源的耗费和环境污染因素的新的扩展帐户,并据此对美国1950-1975年的情况进行了考察,结果他发现,在1975年前,新的指数同GDP是一起增长的(尽管与GDP相比增长较慢),但在1975年,情况发生了变化,新的指数开始下降。佐洛塔斯将其视为一个规律性的特点,认为“经济增长到一定点后会停止提高社会福利,事实上,当一个工业社会到达一个富裕的发达状态后,社会福利的增长率会低于经济的增长率,直至最终变成一个负值。”

GDP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对分配的忽视,对不平等问题关心引发了对社会各阶层不同福利水平进行评估的大量研究。已经有几种测算不平等的方法,如极有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不平等指数有助于评估收入不平等对福利的影响。这一方法被贝克曼、克雷夫和杰克逊的扩展帐户所使用。另一个建立在吉尼系数基础上的不平等测算方法则被纳入当代可能最有影响的扩展帐户——由柯布和丹利于1990年建立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

ISEW)。这一帐户的特点是增加了不平等和环境破坏的因素,并排除了传统扩展帐户中的最大项目——休闲时间的价值。新的指数对美国和英国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得出了与佐洛塔斯类似的研究结果:在1975年-1990年间,尽管美国和英国的GDP持续增长,它们的ISEW仍然分别下降了大约25%和50%。目前,ISEW受到广泛关注,美国、澳大利亚、智利、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英国、荷兰、瑞典等国已开始建立本国的ISEW。它们的指数表明,除了意大利之外,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ISEW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提高,但自那以后,福利水平开始停滞或下降。1995年,柯布、哈尔斯德和洛(Cobb, Halstead & Rowe)又将ISEW进行了有关补充(如加入离婚、犯罪等各种因素),提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 GPI)。

经济学理论强调福利是人们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需要,从而产生效用或满足的过程。经济学家把资源分配问题表述为最大的效用,加强资源的利用性和替代性,发展取得最大效益的普遍方法。GDP模式对福利的测算必然涉及到福利经济学中的道德规范如公正分配、经济效率、自由、均等、民主等概念,其前提是个人偏好可代表“社会偏好”,而“社会福利”或“偏好”取决于社会成员的偏好,其分析方法也就是从这种抽象化的个体经济行为的分析着手,而且“个人偏好”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其研究重点并非“福利”本身,实际上它是集中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适度条件;但在某些方面,它的研究方法,例如在研究社会、经济、科技、人口、资源等问题所采用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社会指标模式

社会指标模式是基于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经济体系而是社会体系,以及社会体系本身植根于自然环境的认识上。福利则是影响人类和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健康和教育、环境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对福利的测算实际上是对满足人类需求的社会系统的评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指标”运动,其内容包括了营养、住房、教育、健康和预期寿命、环境质量、犯罪和贫困线,有时也包括一些像政治自由、言论自由等之类的指标。这些指标不是用货币单位来计算,也不能用通常的会计帐户来表示。

在20世纪70年代初,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定期出版社会指标报告,并很快影响到其他国家。由于社会指标要迎合一定的社会标准,也就使它们隐含着对社会舆论的依赖。在发达国家,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实际上受到社会民主思潮的影响,例如北欧在这一时期进行的“生活水平”调查,就是研究“不平等”对人们福利的影响以及评价实现“平等”的社会条件。但是60年代社会指标运动蓬勃开展时已经确定的社会支出优先的目标,在70年代就遇到财政紧缩的挑战,社会舆论对平等的关注也转向了竞争。相比之下,由于在发展中国家“人的剥夺”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类似的标准争议相对少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基本需求”运动,确定了一系列优先于经济增长的社会目标。1979年,莫里斯(Morris)提出了一个“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它是由婴儿死亡率、识字率和一岁时的预期寿命组成一个简单平均的福利测算方法。

社会指标不仅仅依赖标准,而且能创造标准。在20世纪80

年代,“基本需求”政策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政策以及发展经济学中日益增长的市场导向发生了冲突。后者的结果是利弊掺杂的,但引人注目的是社会进步的成本常常不适当地落到穷人的身上。在80年代后期,对“结构调整”计划的不满促使了一个新的社会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的出现。这是一个由人均收入、出生时预期寿命和一个合成教育指标组成的复合指数,这个指数的构成在某种程度上有随意性,但它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可,并对世界银行在90年代中期开始将贫困作为一个改革目标的转变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莫里斯最新的指数也表明在增长和福利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联系。

社会指标的需要产生于人们对GDP不能把握福利的主要方面的认识。虽然经济增长为改善人们的福利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在社会指标和GDP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莫里斯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表明当人均GDP在大约3000美元(按1981年不变价格计算)以下时,指数和人均GDP的联系就比较紧密,但在3000美元以上后,这种联系就非常脆弱,埃斯特思(Estes)在他的“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 ISP, 1988年)研究中也发现收入对福利影响的类似的变化。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HDI指数实际上也已经包含了收入报酬递减的前提。

事实表明,一些国家虽然收入很低,但达到了相对较高的福利水准(如中国),而一些国家虽然收入较高但福利水平仍然相当低下(如中东一些国家)。上述指数表明在福利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不同步现象。值得一提的是,阿马塔亚·森的理论方法对HDI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森认为,仅仅是收入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福利的本质,在自由的原则下,即使是贫困状态的个人,其优先权和选择的权利也应该受到尊重。在他看来,福利是由获得有价值“作用”的“能力”构成的。

社会指标运动发展初期所声称的自动导致福利目标的确定的思想现已消声匿迹。相反,它的其他用途似乎更可能实现,实际上,它们在许多方面已付诸实施。正是全面的社会指标定义决定了相应的社会指标,可以用于制定社会发展的目标,检查政策或计划的执行结果,甚至可以作为预测和政策的比较评价。但是,也许正是面临太多的外延扩大或政治利益的压力,目前的社会指标研究仍然在研究对象或内容等很多方面显得模糊不清,也影响了在大量社会现象和基础上具有普适性的指标选择。

三、心理指标模式

如果说“扩展帐户模式”是以“经济学人”为基础,那么“心理指标模式”则以“心理学家”为基础。西方学者对福利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是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心理活动等主观内容的考察,以直接评估人们的福利体验,因为经济资源只是福利的中介,它本身并不能代表最终的福利水平。庇古曾经承认:“福利仅仅是由意识状态而不是物质财富构成的”;费雪尔也认为“人类是通过配置和利用物质财富和自然界的力量来努力控制心灵生活之流”。心理指标模式力图直接反映福利体验,它以两种方式检验国民帐户测算福利的有效性:“静态”法评价GDP与福利的心理指标的联系;“动态”法更深入地探测人们的满意度。

像“人类发展”一样,静态的“幸福”研究也产生了一种量化

标准,它在一个序数级(1- 3, 1- 5, 1- 7 或者 1- 10)的基础上由对某个简单问题的主观福利调查数据组成。通常是像这样的调查问题:“将某件事同另一件相比,您如何描述您今天的感受?非常满意,满意或者不是那么满意?”等等。对这类问题的反应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主观性福利”(SWB)。1996年,奥地利的 Ruut Veenhoven 在一个比较的基础上,在超过 3 000 多种刊物上,对大约 93 个国家设计了静态的主观福利调查问卷,并对相关结果建立了“幸福感的数据库”。另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其他的对幸福程度的度量方法。如 1977 年琼斯和彼尔思提出借助行为中的时间消费物,1981 年,朱斯特等人也提出一个相似的指数——“幸福过程指数”,这是将各种活动消费的时间,通过加权得出的特定行为的满足刻度。这种基于时间分配而将人的兴趣加以抽象所得出的行为刻度,既可记载人们各种行为在时间消费需求上所反映的实际上的不满足,也同样可以得出人们各种行为中所达到的幸福标记。1976 年,坎贝尔(Campbell)等人曾提出一项测算总体感觉的调查问卷表,主要内容是由当前常用的几组表明人们生活特征的对应词汇构成,如:厌倦——有兴趣;悲伤的——愉快的;困难——容易等,表中项目对测算总体幸福和总体满足也都有较高的关联性。

在国民收入和 SWB 之间,有的学者如伊斯特林(Easterlin)认为它们缺乏明显的联系,但 Veenhoven 在研究中得出了与 PQLI 类似的结论:即 GDP 达到一定水平后(尽管仍然是相对低水平),SWB 随 GDP 上升的趋势会出现转折。同时,在 1995 年,蒂埃纳(Diener)发现在美国、法国和日本,虽然从 1946 年以来它们的国民收入增加了几倍以上,但 SWB 几乎没有什么改善。

在微观层次,虽然 SWB 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因素和领域相互关联,但最重要的发现表明经济因素对幸福感几乎不起作用,相对而言,人际关系、休闲、工作体验的质量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物质主义同 SWB 是负相关的,特别是对那些认为更多的金钱就能带来更大幸福的人而言,情况更是如此。这些发现同扩展帐户将 2/3 的福利归因于家庭活动和休闲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1993 年,蒂埃纳在对美国历史数据的大量分析中,发现收入同福利的关联值非常低($r=0.12$),在人均收入达到 6 000~ 8 000 美元(1971- 1975 年)后,福利曲线基本上被熨平了。简而言之,主观福利看起来对环境变化并不敏感,收入的提高不会给个人生活带来根本的改善。

在富裕状态下,这种福利与收入的低关联度可能是因为人们只是生来就关心幸福或不幸福。一些学者认为个性对 SWB 有很大的影响,一种观点甚至认为幸福是一种特性而不是一种状态。一项对双胞胎行为的研究表明:社会和经济地位、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或者宗教信仰都不能充分解释他(她)们在“幸福感”上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一半因素是与遗传的不同相联系的。后来的重复测试也说明福利中大约 80% 的稳定要素是可遗传的。这样,在富裕社会里,文化看起来比收入更能影响 SWB。蒂埃纳发现“个人主义”比收入能更好地预测 SWB 的变化,一旦在“个人主义”的支配下,收入和 SWB 的联系就消失了,SWB 在某个水平上的长期稳定甚至被看作“国民特性”,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在发达国家日益增长的不平等没有成为一个主要社会焦点的原因。

动态的研究方法则以各国收入和 SWB 的积极联系为主要

目标,并提出“相对收入假设”,认为影响福利的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从这个观点出发,如果分配状况不改变,即使收入大幅度提高,也不会对福利水平产生影响。社会指标运动发展的早期原动力正是来自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重新发现贫困”,即把贫困看作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剥夺”形式。伊斯特林应用这种相对收入概念,认为相对收入的预期是通过同其他国家的比较形成的,而且每一代人在各自的经验基础上,有不同的满足预期。这样,满意度是不断地向前循环的,生活在“黄金时期”的年轻一代的满意度超过了他们自己的预期,而后来在“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又经历了对他们更高预期的失望。英格勒哈特(Ingelhart)在其对“战后物质主义”的长期研究中得出相关的结论,认为战后的几代人由于更注重经济安全已将他们的偏好从经济因素转向非经济因素。

对满意度的调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心理方法。大部分研究强调了满意度依赖于习惯、刺激、对比和一时的效果,并会随着时间变化,也会在期望、成就和回忆中发生变化。福利经济学假设了消费者自身能将福利最大化的前提,这样“偏好”就等同了福利,但大量的对福利影响因素的实证性研究表明人们常常并没有能做出提高其福利的选择。罗特里(Rowntree)曾经将贫困区分为“一级贫困”和“二级贫困”,前者是因为缺乏生存的资源,而后者是因为冲动性消费和资源管理不善造成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短视选择,即选择较低的回报而不是长远来讲较高的回报,由于与理性选择的假设相矛盾,已经很长时间困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最熟悉的例子像冲动型或沉溺型(如毒品等)消费,消费者甚至在做这样选择的同时都会感到后悔。理性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我控制或谨慎,贝克和穆里根认为在人力资本中要增加对自我控制或谨慎的投资。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观点,人的需求具有无限性,人们在满足需求之后,又产生新的需求,对社会的评估又会有新的标准,会产生新的不满足,这说明福利水平的提高不存在一个“终极”时刻;另外,基本心理概念是无法从一种文化转到另一种文化中去的。譬如,同一社会里的人们对于“幸福”或“满意度”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在完全不同的社会里,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理解更是天上地下。再者,有些福利体验的感情是表达不出来的,譬如自尊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但不能通过快乐或满意等词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它的属于科学部分的行为表达出来。总之,观念的主观性、相对性和复杂性影响心理学方法测算福利的客观性、可比性。

对福利测算方法的探讨推进了人们对福利的理解。对主观因素的调查证明了人们认为国民收入同福利之间存在联系的最初直觉,因为失业对福利有着强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决定福利水平的主要因素不是周期性的经济因素,而是结构上、文化上或人际关系的因素,它对 GDP 变化的敏感度不是人们想像的那么高。亦即,福利不是那么容易变化,而是相对稳定的。

文化是影响这种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在发达工业国家,虽然人均收入水平接近,但是主观福利水平非常不同,存在一个等级状态,最高是北欧,其次是说英语的国家,再次是中南欧,最低的是日本。英格勒哈特认为这种等级代表着对富裕的适应和调整,他按照两种价值取向——追求经济安全和对传统的尊重——将各国进行分类,亦即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富裕,它们减

少对经济安全的关注以及文化适应经济条件变化的程度。

另一个影响这种稳定性的因素是人类天性,似乎与“需求层次”有关。在贫困状态下,由于经济增长能带来大量的物质上的回报,因此基本需求指数同人均收入之间的联系就相当紧密。在富裕状态下,SWB 看起来相当稳定,同穷国相比(SWB 与收入的联系程度非常高),富国的 SWB 同收入等经济指标的联系非常小,这也证明了社会指标研究中已经发现的收入报酬递减规律。扩展帐户和静态心理指标表明福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市场之外,来自人际关系、家庭,以及其他形式的情感因素。在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增长带来的心理回报就变得非常小。而且较高水平的满意度也具有某种不太容易变化的特点,如个性、性别和国民性。

许多研究发现,在 GDP 达到一定水平后福利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除了收入分配、环境破坏等因素之外,创新也可能破坏福利。创新推动了经济竞争,但可能刺激短视的而不是着眼长远的选择。创新破坏了现存的传统和价值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现有的社会和心理资本的破坏。应该提及的是,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指标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正是为评估美国航天计划将给美国社会带来何种非预想性的后果。廉价酒、毒品、烟草、快餐以及所有的创新都曾使社会花了很长时间忙于调整和应付。

几十年来,世界许多国家为福利的定量评估展开了深入持久的研究,出现了大量的成果,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福利的内涵愈加丰富和复杂,对福利测算的难度之大已经超出人们最初的想像,用现有的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准确测算福利的真实水平。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是系统地理解涉及福利的各种因素如预期寿命、收入水平、犯罪、伦理、社会和政治压迫、家庭结构、精神健康、自杀、教育、工作生活的质量、职业安全感、健康服务、城市交通等因素之间如何互相影响,以及它们同心理动机和市场动机的联系,这将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

已经有许多方法试图对上述模式进行综合。例如在经济学者考虑的物质利益和社会指标的结合上,一些人提出生产投入除了时间和金钱等一般基本的实物外,还要加上无形的资源和技能如知识和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此外还有影响时间分配的条件和提供资源分配的环境和背景。经济学的问题就是通过给予有用的资本、条件和时间,以取得福利的最高值;在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人的结合上,一种意见认为,建立以时间的基本单位为基础的社会统计系统,原则上,整个市场经济与生产和家庭物质使用一样,可以理解为交替流动的时间分配。整个产出系统分为两类:第一种是来自时间分配的满足,被称为“过程利益”,即来自于经济活动;第二种是对世界状况的评价,也就是个人占有或利用资本和条件的水平。第二种产出明显来自心理学人的成果,它与第一种都是福利的因素,并不需要同时变化。总之,在福利问题的研究上,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到其出发点的基本哲学问题的重要性,社会学家要考虑怎样把宏观的社会过程和微观的社会感觉联系起来,社会心理学则需要加强对复杂的实际问题的考察和理解。也许,比较现实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追求 GDP 的增长和实现充分就业仍然是它们主要的福利目标,而对发达国家而言,对现有福利的利用应比追求福利的目标置于更优先的考虑。

参考文献:

1. Allardt, E. 1976 "Dimensions of Welfare in a Comparative Scandinavian Study." *Acta Sociologica*, vol 19: 227~ 39
2. Atkinson, Anthony B. 1970 "On Measurement of Inequa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vol 2, (3): 244~ 263
3. Becker, Gary S. and Mulligan, Casey B. 1997. "Th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Time Prefer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 (3): 729~ 758
4. Bradburn, Norman M. 1969. *The Structure of Psychological Well Being*. Chicago.
5. Cobb, Clifford, Halstead, Ted and Rowe, Jonathan 1995. *The 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 Summary of Data and Methodology*. San Francisco.
6. Crafts, N. F. R. 1997.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Changes in Standards of Living: Some Historical Comparisons." *European Review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1, 3: 299~ 332
7. Daly, H. and Cobb, J. 1990.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s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London
8. Diener, Ed and Eunkook, Suh. 1997. "Measuring Quality of Life: Economic, Social and Subjective Indicator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 40, (1- 2): 189~ 216
9. Easterlin, Richard A. 1995. "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vol 27: 35~ 47
10. Fogel, Robert W. 1993.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4, (3): 369~ 395
11. Friends of the Earth Website <http://www.foe.org.uk/progress/>
12. Gershuny, J. and Halpin, B. 1996. "Time Us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cess Benefits." in Offer, A. (ed.), *In Pursui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pp. 188~ 210
13. Morris, Morris David 1996. *Measuring the Changing Quality of the World's Poor: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Brown University Center for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Development, Working Paper No. 23/24 (Providence, R.I.).
14. Nordhaus, W. and Tobin, J. 1972. "Is Growth Obsolete?" NBER 50th Anniversary Colloquium, vol 5 New York
15. Sen, Amartya 1993. "Capability and Well-Being." In Nussbaum, Martha and Sen, Amartya (eds.), *In Pursui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Oxford, pp. 30~ 50
16.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8.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8*. New York
17. Veenhoven, Ruut, World Database of Happiness <http://www.eur.nl/fsw/research/happiness/>
18. Zolotas, Xenophon 1981.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ing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19. [美]K·苏斯耐, G·A·费舍:《生活质量的社会学研究》,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10)。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生 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 陈永清)